



权力与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 著

孟 捷 李民骐 译

孟 捷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三章 包办替代主义与现实政治：工人官僚的政治学

1. 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

正如上一章所述，工人阶级运动中一种劳动的新型社会分工的出现，至少在某些职业化的机关工作人员中间产生出物化的思维方式和对手段——目的辩证法的颠倒。为了巩固对组织的拜物教，提出了一整套原则，其中有些是公开提出来的，另外一些则至少在一段长时期里非正式地存在。这些原则形成了一套或多或少成体系的偏见和诡辩，官僚头子们的行为以此为基础，他们还企图把这套原则作为一般规范强加于官僚机构的成员。

这些原则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官僚中间，要比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官僚中少一些，但同样真实地存在着。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七点：

①强化传统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绝对条件。

②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无条件地尊重法律（“游戏规则”），以及把选举、议会行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作为可选择的手段，偶



尔辅之以合法的罢工行动。^[1]

③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本质上应该是二元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以竞选为目的的政党的特权，工会则限于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④把令人满意的选举结果和对（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尊重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国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接受“国家利益”意味着接受“民族利益”，并将其凌驾于工人阶级利益之上。进而便是支持警察和军队、支持“国防”、支持对外战争（包括那些维护其殖民地的战争）。

⑤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团结和纪律是绝对重要的，必要时不惜以报复冒犯者强行实现这一点。

⑥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领导的权威是十分重要的，并要不惜代价予以维护，包括制裁或开除那些以“人身攻击”的方式贬损领导权威的人（或破坏所谓的“社会主义友爱”的人）。

⑦对这些规则构成威胁甚至质疑的任何实践，包括群众性活动在内，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反对，即使这会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深刻的分裂。这类实践活动包括群众性政治罢工、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法律秩序的公开挑战以及建立工人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

这一套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逐渐加强，到了1914年8月，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和几乎所有的工会终于走上了不归路，以国防为名一致采取了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2]这些组织中传统的“中间派”，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以及后来在奥地利，对这些原则发起了挑战，但都归于无效。到20年代后期，这些原则被普遍接受并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转向俄共和共产国际中的斯大林主义宗派，就会发现有一套更为复杂的原则，这些原则在20年代逐步推行，到30年



代臻于“完全成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对这些原则的次要方面进行了质疑，但是这些教条的基本核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直到 80 年代后期苏联实施公开性的第二阶段，一直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居于统治地位（南斯拉夫共产党部分除外）。这个可怕的束缚加诸诚实的共产党员、容易受骗上当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政治上的同路人以及玩世不恭的帮凶。

这种梦魇般的逻辑的最终结果便是，共产党员和工人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或“客观上”为其所驱使为由，而遭到大规模的镇压。镇压工人事实上意味着镇压资产阶级。这样，“党＝工人阶级”这一公理就产生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条件下，“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

在 1934—1939 年间的苏联，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中达到顶峰的血腥的大规模清洗，成了衡量共产党干部及同路人对克里姆林宫是否忠诚的试金石。支持这些审判意味着接受这一整套教条和由此产生的道德腐败。

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的主要发言人和同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看做是受骗者？他们真的相信 1934—1939 年间或 1949—1953 年间大清洗的受害者是反革命叛徒或帝国主义间谍吗？他们是遮掩罪行和丑闻的同谋吗？他们为这些罪行辩解的理由是，1933 年后唯一的选择是要么斯大林要么希特勒，1945 年后的选择则是要么斯大林要么美帝国主义。这两种态度能混合在一起吗？在此我们只能作些个案研究，并分析一下当事人日后的说法。

充其量我们可以说他们缺乏政治判断力和同情心。若非如此，我们不能不假定他们缺乏个性、缺乏无产阶级的或人类的基本道德，缺乏解放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责任感。在这一章稍后，我们还将回到变成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心理学方面来。这里，



让我们从已经出版的文献中看看发生于苏联和东欧的镇压所激起的四种反应。

法共记者和理论家多米尼克·戴桑梯对她怎样撰写了臭名昭著的小册子《铁托之流的真面目》作了解释。她的动机是自我怀疑、害怕屈从于卢卡奇所谓的一切知识分子都有的“天生的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对派的）倾向、以及想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党保持一致。归根结底，是我们熟悉的两个阵营的逻辑：既然阶级敌人出于其罪恶目的利用铁托—拉伊克—科斯托夫事件来诋毁斯大林和苏联，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斯大林和苏联。^[3]

更天真而简单的解释来自荷兰共产党领导人亨克·戈特察克，他后来成了反对派。他相信莫斯科审判中的所有指控，因为他所信任的荷兰人（正如他相信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那样）向他担保这些审判是完全有根据的。唯一让他“震惊”的是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其过去的革命经历是无可否认的，竟然堕落得如此之深。^[4]

在对斯大林令人恶心的辩护中，英国共产党领导人 J. T. 墨非粉饰大清洗，把它看做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表现，并令人难以置信地辩称，形式上的审判是用以对付犯罪事实确凿的犯人的，这样审判的目的在于政治宣传。与此类似，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 D. N. 普利特、罗曼·罗兰或列昂·福希特万格，以及像瓦尔特·杜兰蒂这样的自由派记者，经常与其自身内在信念相左，公开为莫斯科审判辩护。^[5]

东德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人中唯一天才的理论家鲁道夫·赫尔恩施塔特，提供了大多数这类斯大林主义推理的最令人悲哀的例子。他是党的主要喉舌《新德意志报》的主编、1952—1953 年间大多数政治局文件的起草者。在 1953 年 6 月 17 日工人起义后，乌布里希在克里姆林宫的授意下，把他和秘密警察头子威尔海



姆·蔡塞尔当做替罪羊。这可能是因为赫尔恩施塔特在政治局开展了系统的反对乌布里希独裁倾向的斗争。起义发生后一个月，一个“赫尔恩施塔特—蔡塞尔集团”，以及一份与贝利亚相关联的“社会民主党的投降主义宣言”，被乌布里希及其心腹凭空捏造出来了。

在中央委员会 1953 年 7 月 24—25 日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赫尔恩施塔特自己投票赞成谴责他和蔡塞尔的诽谤性决议。他写道，“对我来说，投票反对中央全会是不可想像的”。说出事实“将会削弱苏联的危险”。他对赫尔曼·马滕——党的总调查人——进一步解释道：“我在一生中完成了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如果党对我说：‘跳到水里去，别问为什么，我会跳下去’。如果党在 7 月 17 日后需要一个‘赫尔恩施塔特—蔡塞尔事件’，我会予以接受。”当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向诽谤者抗议时，他提醒他们：“我们一直在一起唱：‘党是永远正确的。’我们不能改变这一点。”

赫尔恩施塔特的遗孀将他的态度正确地总结如下：“对那些在赫尔恩施塔特‘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来说，党的纪律起到了特殊的但并非最为重要的作用。受到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强烈影响，他们两个人都总是使自己隶属于党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与组织决裂，即使有重大的理由，也是不可能的。那将意味着 30 年的个人活动变得毫无意义。”^[6]

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一直维持着对“帝国主义奸细”的歇斯底里般的恐惧气氛，这被用来证明在基层组织搞大清洗是合理的。在著名的斯摩棱斯克档案中发现了许多典型案例，梅尔利·芬索德与尼古拉·维特对此先后作了分析。^[7]这是在地区法庭基层组织党的书记的报告中的一个例子：“报告人写道，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预感到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胜利，只有采取一个办法：向我们国家派遣间谍和破坏者，破坏我们的经济力量并颠覆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



立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像斯大林同志在二月全会上天才地指出的那样，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尽量往苏联多派特务，其数目远远超过派往其他国家的特务，这样做绝非偶然。”^[8]

二战结束时，包办替代主义的政治前提实际上导致以军事—警察力量自上而下地在东欧（南斯拉夫除外）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一模式与桀骜不驯（若非完全持敌意）的群众是相对立的。^[9]后来发生的事件，包括这些政权在1989年的垮台或濒临垮台，皆滥觞于此原罪。它们证明，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愿“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2. 马克思主义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包办替代主义的那些原理和“逻辑”在理论上全都毫无根据，在政治上则完全服从于官僚的利益。很明显，它们不应该被视为官僚专政的根源：并非斯大林集团的头头们所运用的马列主义版本使官僚专政得以在苏联建立起来，并进而推广到东欧。^[10]而是当热月政变在苏联发生了一段时间以后，官僚集团才于事后提出这套观念，作为官僚垄断权力这一现状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说，在列宁去世之后流行的许多关于党的“季诺维也夫式的”错误观念，使斯大林获胜变得更容易；但官僚制专政绝不是由这套观念产生的。

社会阶级并不是均质的，因为各阶级中特定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经验和教育。因此一般来说它们倾向于形成不止一个党派。多党制与现实中的阶级是相适应的。消灭多党制意味着



不只对其他阶级，而且对至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压制。

的确，一个先锋队党不仅能一贯地为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而且能最好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利益。^{〔11〕}但是，若要充分实现这种潜能，那么这个党就必须牢固地根植于工人阶级、将工人阶级主要阶层的实际经验集中起来、通过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纲领和原则。没有在国内和社会上进行研究和讨论的自由，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12〕}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导集团或哪一个人是不犯错误的。一个先锋队党——如果真是这样的——的唯一优点在于，始终依靠内部民主或公开民主，较少犯错误，纠正错误时更容易、更迅速。^{〔13〕}不迷信“领导”、思想具有批判性、能独立判断各种政策和政治纷争，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条件。^{〔14〕}党内形成派别的权利和公开争论的自由是多党制的必然结果。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其“规则”或“规律”不可能从任何教科书上读到。社会和社会经验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各个社会领域的各种计划 and 政策必须在最广泛的民主条件下争论并付诸实验。^{〔15〕}尤其是经济计划，倘若社会想要达到更高的效率，减少浪费和比例不平衡，那么政治民主——即可以在不同政纲之间进行选择——便是至关重要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自我解放和自治，^{〔16〕}而这要求由广大群众选举出来的机关直接掌握权力——也就是说，党和国家要严格分离开来。先锋队党不是借助于行政或压迫性手段，而是通过正确的纲领去说服多数群众，以实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作用。对于工人自治的一切限制都会造成工人阶级的道德水准下降及对政治漠不关心，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变得困难得多，如果不是不可



能的话。

类似地，针对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越成功，工人阶级越能联合起来投入这场斗争，政治上也就越清醒、越主动。多党制和群众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对于建设这样一个统一的阶级阵线是不可或缺的。^{〔17〕}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自我组织和先锋队党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18〕}向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迈进，不能与现实存在的工人意志相违背而强加于他们；从长期来看，这些统治手段只能帮助和安慰阶级敌人。它们是敌对阶级力量的表现，是拥有特权的工人官僚的利益的表现。罗莎·卢森堡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她临终前曾就这个问题说道：“随着在全国对政治生活的压制，苏维埃的生活必然同样会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每一个公共机关都会失去生机，徒有生命的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是积极的要素。”^{〔19〕}

实践是认识真理的最终裁决者。判断党的决策和政策——从而最终判断党的性质——的决定性标准，是它们对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这在革命前动荡的环境中和革命起义中尤为如此。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在目前所处的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而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思想斗争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20〕}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经常指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以及工人民主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在此我们只限于援引一些语录。

马克思于1868年致函施维泽，谈及拉萨尔分子为他们所控制的工会起草的章程草案：

“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德国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21〕}

1886年，恩格斯就美国工人运动写道：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22〕}

最清楚的莫过于恩格斯写于1890年的一段话：

“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制的假象也应当避免。”^{〔23〕}

一般来说，把社会进步的基本机制转交给代议制间接民主机关的战略，对于广大群众会产生涣散斗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后果。当他们的自助力和自信心减弱时，当他们求助于资本家的“恩赐”并依靠政府对“增长的果实”重新加以分配时，他们融于民主运动就越来越困难了。



3. 列宁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吗？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指责列宁应对包办替代主义、一党专政和斯大林主义负责。今天，在东西方的后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中、甚至在苏联，也越来越多地听到这种指责。^[24]在这种指责背后确有真理吗？

事实上，在 20 世纪初，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最先指责列宁搞包办替代主义。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派别斗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后开始加剧。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中，托洛茨基提出了下面的名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方法导致党的组织替代党，中央委员会替代党的组织，最终一个‘独裁者’将替代中央委员会。”^[25]

这种攻击对于列宁是不公正的。列宁与孟什维克的最初斗争围绕的是如何在非法条件下加强党的组织，从而使党能够维护并发展工人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自主性，并没有提出在群众运动为合法的条件下的普遍模式。的确，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有时在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到 1908 年他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此前一年，在《怎么办？》的再版序言中，他清楚地写道：

“在根本上，当然，它们的成功[即革命组织的成功]是由于，工人阶级——其最优秀的代表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出于客观的经济原因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阶级相比拥有更强的组织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将仅仅是一场游戏、一次冒险、一个单纯的招牌。《怎么办？》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它所



倡导的组织除了与‘自发起来斗争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相结合外，没有任何意义”。

在同一篇序言中论及 1905 年革命的教训时，他又写道：

“尽管有分裂，但是社会民主党能够早于任何其他党利用暂时的自由去建立一个合法组织，这个组织具有理想的民主结构、选举结构以及根据组织起来的成员人数形成的会议代表制。”^[26]

在 1905 年革命过程中，列宁更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接近于 30 年代成熟的托洛茨基对问题的系统阐述：

“我觉得拉金同志是不正确的……是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我觉得……答案无疑应该是：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我认为，作为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竭力把所有的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等的代表，把一切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一切只要起码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做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27]

与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成员”不同，列宁毫不含糊地断言：

“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28]

这一吁求与斯大林的观点即“干部只能通过国内战争被撤换”相距何以道里计！列宁毫不踌躇地明确提出：“在党的纲领原则的范围内，批评必须十分自由……不仅在党的会议上应该这样，而且



在公共会议上也应该如此。”^[29]

列宁与工人阶级解放的包办替代主义思想相去甚远，他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根本没有提及“党的领导作用”。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也是如此，它是 1923—1924 年苏联宪法的样板。1917—1919 年间列宁的所有著述贯穿了这样的思想：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家庭主妇，而不仅是党员或干部，应该“决定每一件事”。^[30]

同样，在 1905 年 11—12 月采用的布尔什维克章程和组织原则，并没有证明那种认为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根本一致的观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

“所有党员必须参加党的机构的选举。所有党的机构定期选举、可以被撤换、并有义务阶段性地或应选举他们的组织的要求随时解释其行动。

“领导集体的决策要受那些组织成员的制约，领导集体是这些组织的机构。

“影响到整个组织的行动（如代表大会，重组）必须由组织的全体成员来决定。下级组织的决定若与上级组织的决定相矛盾，不予执行。”^[31]

“在承认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要性的同时，会议认为广泛实施选举原则也是必要的；并且，选举出来的核心在意识形态和实际领导上被赋予充分权力的同时，他们仍可被撤换，他们的行动应具广泛的公开性，并对其行动负严格责任。”^[32]

1906 年，列宁甚至建议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将全体党员公决予以制度化。将所有这一切与代表斯大林主义立场的“官方”陈述比较一下：

“党要正确地发挥作用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就必须按集中制



原则组织起来，就需要有统一的党章，需要有统一的党的纪律，需要有由党代表大会所体现、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中央委员会所体现的统一的全党最高领导机关，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没有这些条件，工人阶级的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就不能实现领导本阶级的任务。”^{〔33〕}

斯大林主义的文本在提到民主集中制时，将民主集中制局限于由党员选举领导机构。^{〔34〕}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经验相反，禁止异议、派别和不同于多数领导的纲领，均被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提出来作为组织的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这是党内民主的本质）完全隶属于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和统一，而无视其政策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党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它披着批评自由的外衣，目的却是污蔑和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精神的原则。”^{〔35〕}列宁提出的所有党的工作人员都要负责任和可替换的原则，在党内外可自由批评和讨论的原则，地方组织拥有自主性的原则，有权提出替代性纲领的原则——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消失了。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苏联展开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源、组织原则与官僚制专政的关系的争论，业已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和官僚主义集中制之间的基本区别。譬如，负责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列昂·奥尼科夫陈述道：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解释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塞进了党章。……首先，他把集中高于民主的个人观点合法化了；第二，他把这个原则神圣化了，从而排除了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灵活地调整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在十七大和二十六次之间……对民主集中制的这种斯大林主义解释被弄得永恒化了。……在十七大以后，党完全接管了国家行政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在由党章加以确定之后，斯大林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被机械地扩展到苏维埃和管理机关的活动中。官僚集中制的绝



对胜利有一个血腥的标志：1937 年。”^[36]

下面的话更加清楚：

“一直到现在，党应用了由斯大林倡导的规范和原则：首先，在党的组织结构上，机关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大多数党员完全丧失了权利；第二，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员的品格，流行着惟命是从、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愿展现任何独立性；首创性和公民的勇气消失了，没有能力采取勇敢的行动。结果是：党成了它所创造的制度的奴隶；而一旦党的行政职能与自身脱离之后，制度则证明无法按正常方式运转。”^[37]

换言之，官僚集中制和未经选举、不受控制的全能机关的统治，非但远未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反而使党成了官僚制的囚徒，根本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行使任何“领导作用”。列宁在 1922 年业已注意到这一点，左翼反对派则在 1923 年 10 月重新提出了这一点。^[38]

至于布坚科，他认识到在二十七次之前流行于苏联的意识形态观念，包括那些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观念，“倾向于从理论上解释官僚集中制的动因并为其作思想上的辩护……——这是官僚制日常活动的自然结果……是其全部不变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其职业的、社会的欲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溢出这套观念体系，其日常活动便无法正常进行。”^[39]

4. 1920—1921 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

在内战结束时，俄国的经济条件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工业产值下降到 1914 年水平的 18% 和 1917 年水平的 24%。^[40] 产



业无产阶级从 1917 年的 300 万人下降到 1921—1922 年的 1243000 人。^[41]的确，雇员的人数，特别是公务员，增长十分迅速。而且到 20 年代中期工会成员从 1917 年的 70 万人上升到 500 多万人。^[42]然而，整个城市人口下降了 30% 多。^[43]饥谨、疾病、时疫肆虐。悲惨的生活和道德沦丧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的身上。

在这种背景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允许局部地重新引进市场关系。工业、尤其是农业生产迅速显示出明显的增长势头，工人人数也是如此。^[44]然而，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撤退伴随着政治上的转向，即禁止除俄共之外的任何政党和团体的存在，不久又禁止俄共内部的派别活动。

在这些措施中有些自相矛盾之处。政府在战争条件下曾努力维持最大限度的民主^[45]，但是战争胜利后却不再这样做了。在我们看来，对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他在生命最后关头以明显自我批评的口吻写道：“对反对党的禁绝造成对党内派别的禁绝。对党内派别的禁绝最终禁绝了与自诩一贯正确的领导不同的思想。以警察方式制造的一党专制导致官僚特权，而这是一切淫奢和腐败的根源。”^[46]

维克多·谢尔盖在其《俄国革命第一年》中，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趋势：“随着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党之间的各种不同思想的政治辩论的消失，由共产党人控制的苏维埃机构，从地方苏维埃到 VTsIK 和人民委员会，便像在真空中运行：既然所有决策都取决于党，那么苏维埃所能做的只是加盖官方橡皮图章。”^[47]

这一转向的根源是两个假设，其中一个是完全错误的，另一个有一半错误（即从当时的环境看是对的，但从长期来看是错误的）。前者断定，尽管内战取得了胜利，但饥荒的经济形势和新经济政策的后果事实上使得反革命的威胁比以往更大了。这一立场低估了



政治因素在历史和阶级斗争中的相对自主性，故而纯属经济主义观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传统与此恰好相反，因此这一立场至少可以说是奇怪的）。不论从事后还是从当时来看，遍布俄国的富农并不足以成为导致政治集中制的因素，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的威胁，显然不如由帝国主义支持的高尔察克、弗兰格尔、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的军队所构成的威胁大。

初看起来第二个观点有更可靠的依据。战争的结束在包括布尔什维克工人在内的群众中带来了松懈和较平静地生活的愿望。而且，由于战争的缘故工人阶级人数锐减、社会地位下降，使生产猛跌，其最优秀分子则被吸收进军队和国家机关。当时群众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消极、缺乏日复一日地奋起反抗反革命威胁的准备。保卫革命必然更多地要依靠具有阶级意识的党的干部，进而又较以往更多地依靠专门化的机关。^[48]

对新经济政策前夕苏俄形势的这种描绘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一分析当中遗漏了事态发展或可能发展的方向这一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即限制苏维埃和党内民主的措施会有什么后果？事实上，在采取新经济政策后，社会的崩溃迅速受到阻止。工资收入者的数目很快达到并超过了 1916 年的水平。实际工资上升，文化生活繁荣起来，熟练工人在人数和技术上都提高了。工人阶级更强有力地直接行使权力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得以创造出来。到 1924 年，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客观上下降的描述已经非常不合适了，到 1927 年就更是如此。20 年代初工人阶级消极化的趋势本来可以被扭转过来。

不过，在越来越多的限制和由机关统治的氛围里，这样的政治复苏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样的复苏绝对需要拓展苏维埃和党内民主。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在 1920—1921 年采取的措施，通过对工人阶级自我能动性水平所产生的影响，起到了巩